

出走：

顾准思想研究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顾准研究书系

蒋贤斌 著

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
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
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

——顾准

出走

顾准思想研究

蒋贤斌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走:顾准思想研究/蒋贤斌著. —福州:福建
教育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334-5444-9

I. ①出… II. ①蒋… III. ①顾准(1915~1974)—
思想评论 IV. ①K825.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5586 号

出走:顾准思想研究

蒋贤斌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3752790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350012)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3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444-9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旨意	1
二、研究综述	4
三、研究框架	16
四、研究方式、方法	19
第一章 走向革命	22
一、个人性格：“狷狂”与“背离”	22
二、历史情境：革命理论与体验	29
三、立志革命：民族危亡与理想主义	36
第二章 立命探索	42
一、失败：革命队伍中的经历	42
二、幻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52
三、安身立命：经济研究所	60
四、炼狱：1957—1974年	65
第三章 思想突破与基础	73
一、突破	73
二、走向经验主义	80
三、多元主义与经验进步观	88
第四章 “市场取向”的提出	98
一、中国“市场取向”第一人	98
二、计划经济：从理想到现实	102
三、从价值规律到“市场取向”	108

第五章 “娜拉出走” 命题	120
一、鲁迅：“娜拉出走后怎样”	120
二、反思革命：“群体” 出走以后	125
三、对两种现代制度的反思——兼论人类解放问题	139
第六章 民主思想	155
一、“文革大民主”	155
二、间接民主	160
第七章 探索古希腊民主的起源	177
一、《希腊城邦制度》	178
二、古希腊民主的演进	181
三、文本的背后：两个问题与一个迷惘	190
第八章 对资本主义产生问题的研究	202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	203
二、资本主义产生的制度因素	211
三、西方精神文化与资本主义的产生	220
结束语	227
一、思想发展脉络与理论资源	227
二、思想史上的呈现	237
三、一个出走的人	244
参考文献：	246
后 记	262

绪论

一、研究旨意

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断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言甚是！但此话的“反说”：“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则显然难以成立。这就意味着，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研究当代史无疑是一个带有“冒险”行为的研究。为什么要“冒险”研究顾准这一个当代史中的人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谈谈顾准是如何走进“当代史”的。1994年，顾准去世已经整整20年了，但，这一年的9月，随着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顾准才“进入”了整个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视野里和话语中，并进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个热门的公共话题。《顾准文集》里的什么内容使顾准在去世20年后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呢？

在《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一文中，我指出顾准的“诞生”首先是一个当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精神事件，特别是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精神事件^[1]。20世纪80年代，开放激发了中国学术界的活力，但也使中国知识分子备感压力，以中国思想界为例：面对世界，相对西方同行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反思，中国对“文革”的批判除了政治口号性和政党性言论外，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思想上、文化上深层次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在此问题上的缺失，使人在谈到1949年以来中国思想界更是以“无一人”来描述，“自从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2]；反观历史，1957年“反右”以后，中国“思想者”集体“失踪”了，遇罗克、张志新等烈士的出现

[1] 蒋贤斌：《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6月（上期）。

[2]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改革》1995年第5期。

实际上凸显了这一窘境，正如有人所说：“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和诱惑，众多职业‘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这是无论下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1]

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随着《顾准文集》的出版，顾准出现了。在思想学术界，谁说我们无人？“我们有顾准！”李慎之如是说。^[2]之所以这样肯定顾准，是因为《顾准文集》中体现出了顾准深邃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站在世界思想学术的视角来看，朱学勤教授认为，在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上，顾准得出了与韦伯相同的结论；在对古代文明研究上，得出了与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大体相符的认识；其他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顾准近20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顾准也亦有触及；“以顾准之见识，不说能与外部第一流西方思想成果相汇通，至少也与葛兰西、卢卡契当年从内部反思国际共运之历史挫折，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3]而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顾准更是填补了中国“反右”事件后中国思想家集体“失踪”的尴尬处境，彰显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品性，从1952年的“三反”运动开始，顾准在人生道路上，一路跌落，直至谷底，但他却坚持在“地狱里思考”，“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在思想学术上取得了惊人成绩，用王元化的话来说：“顾准的思想比他同时代人整整超前了十年。”^[4]

一个在20世纪末让整个中国知识界群体称赞和折服的人，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及学术到底有什么内容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这些思想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他又是凭借什么样的学术理论资源和人格品性使他能“在地狱里思考”呢？如此等等。显然，这些都是我研究顾准所感兴趣并要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勾勒顾准的心路历程，分析他人生中的两次自觉对

[1] 陈少京：《张志新蒙难之后》，<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party/first/200206271826.htm>。

[2]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3] 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载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年版。

[4] 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文汇报读书周报》1994年12月3日。

“志业”的选择——1930年代选择职业革命家和1950年代志于探索的研究者、反思者，找出顾准思想的特质，梳理他思想观点的理论渊源，进而在人们面前展现一个“真实”的顾准和他的思想观念，这是本书所要追求的。

基于上面的研究，在书中还想要追求的是，探讨顾准的思想探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这里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空间上，通过对顾准思想观念的研究，试图呈现出当代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应该说，任何时代，一个国家的思想界都是丰富多样的，近代以降，中国的思想界就更是显现出不同的思想理论流派和潮流，这固然使中国思想界充满了紧张与冲突，但同样展示了多种的可能性，在这些可能性中当然也蕴涵了希望。但面对“文革”时代，一统江山的意识形态似乎“终结了”中国思想丰富的内涵。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通过对顾准思想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在当时被称为“异端”的思想仍然存在，虽然，它们只是处于“地下活动”，存活于“私密空间”，不能走进当时公开的政治话语领域，但它的真实存在既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思想史的图景，又蕴涵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今天中国的现实，不正是当时“潜藏”思想的较好的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吗？

在时间上，亦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里、系谱中，顾准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虽然，国内外有人对顾准文章中所体现出的理论水准表示了怀疑，但大陆学界是普遍性认同顾准思想的深度和价值的。基于此，当代自由主义者便把顾准定位为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1]，对此，“新左派”持相反的意见^[2]；不过，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当今的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都不否定顾准，他们似乎都在争夺顾准这一“符号”。这反映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如何定位顾准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

如众所知，顾准的思想产生于他受难时期，可以说顾准是“因罹难而思

[1] 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载《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朱学勤：《1998年自由主义常理的言说》，载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239页；何家栋：《未了的心愿》，载丁东主编：《怀念李慎之》上册（自印本，2003年），第65页。亦参见何家栋：《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http://www.legal-history.net/go.asp?id=1238>；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和李慎之》，《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总第77期。

[2] 旷为荣、旷新年：《把顾准还给顾准》，《读书》2003年第4期。这篇文章在网络上的标题是《不要神化顾准：兼论社会主义民主》，<http://guancha.gmw.cn/2003-06/030611/030611-21.htm>。

想”。但，显然顾准思想的价值并非是对自身“罹难”的反思，而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甚至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独立性的学术反思。这种置自己的苦难于不顾，在严酷的思想压力下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对于探索、建设人类美好的事业来说，如何肯定也是不为过的。我希望通过对顾准的研究张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有助于人们坚信，即使在最苦难的处境下，仍有人在满怀信念地坚持思考着如何寻找人类走向幸福的道路，他（或她）用自己的生命和作品在黑暗的年代里点燃了启明的光。黑暗中，这人，这光，虽一灯如豆，微弱闪烁，但却正是民族、人类的希望所在！

二、研究综述

国内思想学术界对顾准及其思想进行较广泛的介绍、研究是在《顾准文集》出版以后的事，但在1980年代中期，学界已对顾准的学术思想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讨论。1982年3月，顾准在1974年写成的《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书名出版了，它引起了国内世界史学界的关注和评论，1984年，《世界历史》杂志第三期刊登了廖学盛的《〈希腊城邦制度〉读后》和修海涛的《百家异说 一家之言——评〈希腊城邦制度〉》两篇文章，文章中，他们对顾准在希腊城邦研究领域开拓性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概述，认为此书是“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关于古希腊政治经济制度史的第一部专著”，“是我国城邦史的开山之作……为城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朵奇葩”；同时对“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同样是对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崔之元的《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读书》杂志1984年第4期）、何新的《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来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读书》杂志1986年第11期）都对顾准在书中体现出来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颖和突破给予了高度评价，崔之元认为顾准在书中的观点冲击了当时仍然起主导地位的“五种生产方式单线发展论”；何新指出

[1] 廖学盛：《〈希腊城邦制度〉读后》；修海涛：《百家异说 一家之言——评〈希腊城邦制度〉》，《世界历史》1984年第3期。

顾准的这部遗著“实际是一部渗透着深刻的历史反省意识的著作。因为这部著作的目的，是通过对古希腊民主制的研究，揭示出希腊——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在出发点上的巨大不同，从而挖掘出中国政治专制主义的深刻历史根源”^[1]。

1994年，随着《顾准文集》的出版，对顾准的研究也就进入了一个新台阶，综合来看，有关顾准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顾准文献的收集与整理、顾准人物及思想的介绍和研究、对顾准及其学术思想的争论。

先来谈第一个方面，顾准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在1990年代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顾准的两本翻译著作：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79年）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论文集》（1984年）；80年代，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整理出版了顾准的几部著作，其中会计类两部：《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会计原理》（先于1983年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但既无出版社署名，也无版权页，也没有书号；后于1984年由上海的知识出版社出版）；史学类一部：《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些著作中以《希腊城邦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对顾准思想理论的研究最有价值，后者为了解顾准的理论资源提供了帮助，而前者是顾准学术研究的重要代表作。

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此书由陈敏之先生编辑而成，其中收集了顾准在1973年至1974年间写的文字，这些文字是当时顾准与陈敏之以通信方式进行学术讨论留下的。由于是私人通信，这些思想性很强的文字是以信函、笔记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书中的文章反映了“文革”时代顾准的思想探索和学术研究，是了解、研究顾准思想的主要读本。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它可以说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大陆版，不过，其中增加了顾准关于民主问题论述的两篇重要笔记：《民主与“终极目的”》和《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出版后，引发了中国知识文化界的“顾准热”，人们进而渴望了

[1] 崔之元：《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读书》1984年第4期；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来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读书》1986年第11期。

解更多有关顾准的资料。1997年，陈敏之和丁东把顾准留下的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写于河南商城的日记、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写于河南息县东岳和明港的日记，以及1972年10月13日至1974年10月15日写于北京的日记整理成《顾准日记》出版了（经济日报出版社）。《顾准日记》无疑是了解、研究顾准思想的重要资料，由于日记中的一部分内容真实记录了1959—1960年间顾准在商城农村改造的生存状况和心理活动，因而也就成为了研究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中国政治改造方面的重要资料。

2002年陈敏之、顾南九编的包括《顾准文稿》、《顾准自述》、《顾准日记》、《顾准笔记》的《顾准文存》一套四卷出版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是目前最为完整的顾准文集。《顾准文稿》主要是以《顾准文集》的内容为主，增加了8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稿，这对了解顾准的经济思想有重大帮助；《顾准日记》主要是以原《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为主，增加了1955年9月至1956年7月的“党校日记”、“1959年二三月间日记”、“1960年二三月间日记”三个部分，这三个时间段正是顾准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阶段，因而是研究顾准思想演变、发展的重要资料；《顾准自述》是顾准写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史交代材料和其他关于自己身世和思想的检讨文字，其中明显打上了那个时代“革命”话语的烙印，但对了解顾准的成长经历以及从另一个侧面为研究顾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料，只是由于编者的顾虑，有近四千字的文字材料被删节了；《顾准笔记》是编者从顾准大量的读书笔记卡片中整理出来的，分为“历史笔记”、“西方经济学笔记”、“马恩全集笔记”三个部分，它对了解研究顾准的知识、思想的理论渊源有较大帮助。

从现在我所了解的情况看，还没有收集成册正式出版的顾准文章还有两大块，一是他在1949年以前写的会计方面的著作论文和抗战期间写的政论时评；二是1949年至1952年他在上海任财政部局长兼税务局长期间写的财政税收及相关政策的文章。顾准1949年以前会计方面的论著和他任上海财政部局长期间写的文章，由于是专业技术性和政策性过强的文章，对顾准思想研究的价值并不太大；在抗战时期的政论文章对了解研究当时顾准的思想有一定帮助，但因其主要是以宣传方针政策为内容的文章，所以其价值也

不太高。

《顾准文存》是目前最为完整的顾准文集，它收集了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2年以后顾准的相关文献，顾准反思的思想历程正是从“三反”以后开始的，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随着《顾准文存》四卷本的出版发行，研究顾准思想的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了。

第二个方面，关于顾准人物及思想的介绍和研究。思想家顾准的“诞生”与陈敏之的作用密不可分，甚至于可以说没有陈敏之，就不可能有历史上的顾准，正是由于陈敏之的提问，顾准的思想观念才趁势而出。从上文我们也知道，主要还是陈敏之整理顾准相关文献，当然，他同样也是最早介绍、研究顾准及其思想的人。从现有的资料上看，1975年4月陈敏之的《〈希腊城邦制度〉读后记》的短文应该是研究顾准最早的文章，文章对顾准研究希腊城邦制度的背景及旨意进行了说明，并对顾准的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给予了肯定。1988年，陈敏之写了《顾准传略》，收录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一书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最早综合性介绍顾准生平的文章，文章里，陈敏之除简单介绍顾准的生平外，还对顾准文章和著作进行了概括性的点评及介绍。在《顾准文集》出版时，陈敏之把这篇传改名为《顾准传记》附在书中作为“附二”再次发表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序、《顾准文集》中的“序”及“附一：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中，陈敏之又对顾准的一些情况及其文章作了一定的介绍。此后，陈敏之先生又写了十余篇与顾准相关的文章，其中《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顾准的最后十年》、《顾准和他的儿女们》、《顾准的妻子——汪璧》等文章，对顾准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和亲人进行了介绍，这些资料成为后来研究者了解顾准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而《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读〈顾准文集〉札记》两文则可以说是陈敏之研究顾准及其思想的代表作，在前文中，作者把顾准的一生经历分为走向革命（1927—1940年）、革命队伍中的沉浮（1940—1956年）和艰苦的探索研究（1956—1974年）三个时期进行了论述，并着重对顾准的重要学术笔记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和阐述，并对顾准的学术思想给予了高度肯定，尽管此文存在介

绍性过强、研究性不足的缺点,但应该说此文仍是研究顾准的重要论文之一。^[1]

《顾准文集》出版至今,介绍、研究顾准的文章、著作大量出版,据统计,文章约有150篇、专著4部、论文集3部。^[2]其中影响较大、较重要的论文有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和《关于近年来的反思答问》、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刘军宁《理想之敌 思想之友》、林贤治《读顾准》、丁东《顾准散论》、俞可平《后革命与中国传统政治——再读〈顾准文集〉》、陶东风《挖掘专制主义的学理依据与人性根源——从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说开去》、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吴敬琏《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等。这些文章充分肯定了顾准坚持在“地狱”里进行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和顾准学术思想的价值,同时对他的学术成果、思想内容进行了概括和点评,例如:王元化先生列举出顾准在八个方面有价值的成果,这八个方面是: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先秦学术的概述、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和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3]朱学勤教授认为顾准的“先知”主要体现在:语言问题、韦伯问题、雅斯贝尔斯问题、市民社会问题以及其他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方面。^[4]徐友渔研究员敏锐地指出,顾准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起的一个重大作用是——承前启后,认为顾准不仅连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思想问题意识,而且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中国民主问题、哲学问题等方面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思想也是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特征。^[5]刘军宁认为,顾准的学术思想成果对当代人产生的震撼力来自于顾准思想的转变,即在公共政

[1] 陈敏之先生介绍和研究顾准的文章均收录在陈敏之著的《我与顾准》一书中,此处相关文字都引自此书,参见陈敏之:《我与顾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 150余篇文章中,重要的多数已收集在陈敏之、丁东编的《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和罗银胜编的《顾准再思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3]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载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4] 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

[5] 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东方》1996年第2期。

治领域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转变，在道德领域从意图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1]俞可平认为顾准的思想是现代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只有把它放到现代中国革命的环境中，才能真正把握其意义和价值，他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滋生出的思想分为反革命的、继续革命的和后革命三个不同类型的思想，认为顾准属于后革命类型的思想家；俞可平还对顾准用历史比较法对传统中国政治进行的思考进行了深入论述。^[2]陶东风认为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是顾准学术思想的中心议题，顾准通过对终极目的、唯理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激进主义的分析、否定，揭露了专制主义背后的一整套学理依据。^[3]单世联在研究中国当代思想界告别黑格尔的思想史的演进中突出强调顾准的位置，并认为，顾准对后人的真正贡献在于“从思考‘终极目的’到告别革命”^[4]。

这些对顾准思想、学术研究与探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概括、分析、论述，其中不少文章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以后对顾准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开了一个好头。不过，或许是对顾准人格、品行的推崇，这些文章大都缺少剖析性的研讨，总结性的宏大定论过多，细致精密性的梳理和探讨则欠缺。

对顾准一生经历、思想历程要进行全面介绍的专著有罗银胜的《顾准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和高建国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顾准传》是国内第一部写顾准的传记，作者罗银胜早在80年代上半期就开始着手准备写顾准传，历经十余载，阅读了大量发表的和当时没有公开的文献资料，走访了许多顾准的家属和生前好友，因而这是一本全面而详细地介绍顾准生平的传记，对于顾准的思想形成书中也进行了一定的介绍。高建国也用了十余年时间写成《顾准全传》，较前书而言，该全传在关于顾准思想方面给予了更多的介绍，并提出顾准有三次“思想高峰”的说法，注意到了顾准与他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关系问题。总的看来，这两部传记是了解顾准生平的重要读物，也是研究顾准

[1] 刘军宁：《理想之敌 理想之友》，《东方》1996年第2期。

[2] 俞可平：《后革命与中国传统政治——再读〈顾准文集〉》，《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3] 陶东风：《挖掘专制主义的学理依据与人性根源——从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说开去》，《开放时代》1996年第3期。

[4] 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8期。

的重要参考资料，但由于它们都属于文学性的传记作品，因而在文字上存在着文学描述过强、情感色彩过重的特点；另外，在引用资料和下结论方面，两本书都有不太严谨的现象，很多事件的原因分析和观点都不加分析、甄别地直接引自“顾准自述”和陈敏之文章中的观点，如对顾准在“三反”中问题的描述和讨论，等等。2005年罗银胜又先后出版了两本介绍顾准生平的著作：《顾准画传》（团结出版社出版）和《顾准的最后2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陈哲夫在其主编的《21世纪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第十一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第五节以“顾准在‘文革’期间的沉思”为标题，把顾准的思想分为七个部分进行了叙述，虽然分析和论证力度不够深，但这是目前在中国思想史通史著书中第一次把顾准思想列入了其中一个章节，凸显了顾准在1949年后中国思想界的地位。

第三个方面，有关顾准及其学术思想的争论。任何学术研究必定伴随着学术争论，对顾准的研究也是如此，概括而言，对顾准及其学术思想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争论：

1. “两个顾准”的争论

如果说《顾准文集》的出版使顾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一个“精神榜样”的话，那么，1997年《顾准日记》的出版则使这个“榜样”遭到了质疑，它直接引发了“两个顾准”的争论。

《顾准日记》包括顾准三个时期的日记：“商城日记”（1959年10月—1960年1月）、“息县日记”（1969年10月—1971年9月）、“北京日记”（1972年10月13日—1974年10月15日）。其中“商城日记”的文字里所表现出来的顾准的内心活动与《顾准文集》所塑造出来的顾准是交相辉映的，它进一步确立了顾准作为一个独立精神与正直人格的知识分子形象。引发争议的是“息县日记”。

“息县日记”，顾准自己把它定名为“新生日记”。有学者认为，在这本日记里，顾准“以往那种学者情怀基本没有了，从前那种独立思考也悄然不见

了”。对“文革”不仅没有了批判精神,相反却表现出了要接受“改造”、争取“新生”的心理活动。于是有的读者惊呼:在“文革”时期,顾准“高傲而沉思的神情无影无踪,几年前的那个睿智的、无畏的思想巨人哪里去了呢?”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沙叶新作了解释:一是顾准担心日记被抄,故意写了一本紧跟“革命”形势而没有批判性的伪日记;二是顾准在种种压力下的确改变了,他放弃了原来的“独立品格”要“重新做人”。^[1]

沙叶新本人对他自己的这两种解释“存而不论”,但学者林贤治则著文《两个顾准》,鲜明地表明自己持第二种解释的观点,并说:在“文革”时期,“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2]。此论一出,李慎之便立刻著文否定,认为顾准的“息县日记”是伪日记,支持沙叶新的第一种解释,强调顾准只有“一个”。《顾准日记》的两个编者陈敏之、丁东也相继发表观点,持与李慎之相似的意见。^[3]李国文则认为,不是什么“两个顾准”的问题,而是顾准存在着人性的两面,即所谓“雅努斯”现象。^[4]

2. 对顾准学术思想价值的争论

或许受《顾准日记》引发的争论的影响,1997年底,学术界中人萧蓬父和许苏民在一篇文章中对顾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论述提出不同意见,并认为顾准思想是“以其遭遇受到广泛同情”而“风靡学界”的。^[5]显然,文中对顾准思想的价值显示出异议。不过,大陆学界并没有人呼应萧文的观点。

2003年,李慎之的去世引发海内外学者对李慎之的讨论,顾准也因此而被涉及。如果说,国内学界对顾准思想学术只是有人质疑的话,那么,海外

[1] 沙叶新:《泪眼读顾准》,《文汇报》1997年12月3日。

[2] 林贤治:《两个顾准》,《南方周末》1998年2月6日。

[3]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3月28日;陈敏之:《关于〈顾准日记〉的一点说明》;丁东:《顾准之谜我见》,《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5月23日。

[4] 李国文:《顾准的“雅努斯”现象》,《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2期。雅努斯(Janus)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他的脑袋长有前后两副面孔,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在罗马神话里,他是天宫守门人,每天一早把天宫的大门打开,让阳光普照大地;黄昏时分再把大门关上,于是,黑夜就来临了。同时,他还是司农业、文艺、建筑、造船、铸币、旅行和航海的神。“雅努斯”现象,是指人如同那位天宫守门人雅努斯,具有两张不同的面孔:或美和丑,或善和恶,或是和非,或真和假。

[5] 萧蓬父、许苏民:《唯物史观与明清学术研究》,《光明日报》1997年12月30日。

的个别华人学者则对顾准的思想学术公开持否定态度，其中以仲维光为代表。

仲维光说：“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入门……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1] 曹长青等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2]

对于仲维光的观点，朱学勤认为这是作者“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并指出：顾准当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这是不容后人所任意“轻薄”的，而顾准所得的“知识”是“鼓面上的常识”，是“思想的常识”，它比经“学术训练”而写出来的“学术知识”更有价值和生命力，因为，后来的“学术知识”只是对其作的注解。^[3]

3. 关于顾准是什么样的思想家的争论

围绕顾准争论并不限于其“精神”与“思想学术”问题，关于顾准思想定位的问题也展开了激烈争论。对顾准的“定位”问题——具体地说，顾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的问题。这一问题首先是由李慎之提出来的，他认为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

李慎之在1997年为《顾准日记》作序的文章中首次点明：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

[1] 仲维光：《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zhongweiguang_lishenzhi.htm。亦可参见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总第77期。曹长青：《我非得认“高玉宝是乔伊斯”吗？》，http://209.246.126.241/MainNews/Opinion/2003_6_24_13_2_50_657.html。

[2] 曹长青：《我非得认“高玉宝是乔伊斯”吗？》，http://209.246.126.241/MainNews/Opinion/2003_6_24_13_2_50_657.html。

[3] 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